

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

原創：馬修·斯圖爾特 譯家 YJ

譯家 YJ

《譯家》精選英文刊物高質量文章，致力於及時為讀者提供準確、流暢、優美的譯文。所有譯文均由原載刊物官方授權翻譯傳播；如需轉載，請事先聯繫。

階層分化毫無疑問在毒害着社會，並且正在快速走向無法彌合的程度。而你，也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作者】馬修·斯圖爾特 (Matthew Stewart) 著有《自然之神——美利堅共和國的非法起源》(Nature's God: The Heret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及《管理的神話》(The Management Myth) 等書

【翻譯】張海雲,楊刁刁,華思睿,張拓木

【校對】李雅坤,Xujun Eberlein

【編者按】

在階級差異和貧富差距的討論中，“中產階級”的標籤無論在中國社會還是美國社會都是“免罪金牌”。我們這個群體里自稱“中產階級”的精英們，靠着良好的教育，在每一次升學求職的競爭中以分數簡歷躋身前列，得到了相對舒適的人生，擁有受人尊敬的職業——醫生、律師、金融家、諮詢師、工程師、學者、文化人，住在“好”社區里，穩當鎮密地安排着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在美國這個“機會之地”是這樣，在“中國夢”的圖景下也趨于此。我們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財產和社會地位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對此我們毫不懷疑。

這就是 9.9% 一族。本文作者是其中一員；翻譯這篇文章的我們，以及正在讀文章的你，都可能是。然而又是怎樣？請閱讀此文。

1. 消逝的貴族

小時候，每年我會有一周時間躋身於美國日薄西山的貴族階層。有時是在聖誕前後，更多的時候是在獨立日那天，我們會舉家去我祖父的某個鄉村俱樂部住一陣，有時在芝加哥，有時在佛羅里達的棕櫚灘，或者北卡的阿什維爾。早餐自助總是豐盛無比；我祖父作為東道主總是樂呵呵的，時不時蹦出一個熟悉的故事，還總不失時機地糾正大家的俱樂部禮儀。我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吞吐着雪茄煙對我講，我們這一週的奢侈要歸功於我的曾祖父，羅伯特·W·斯圖爾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他曾是老羅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騎兵”，在 20 年代出任印第安納州的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的時候積累了這些財富。他還對我說，由於某種古老久遠卻不明晰的原因，洛克菲勒家族和我們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後我才瞭解到，這些關於上校曾祖父和大亨們之間糾紛的坊間傳聞與事實相去甚遠。

一周結束，我們又會回到自己家。我的現實生活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美軍基地與周邊社區的徹頭徹尾的中產階級水平。日子也過得不錯，然而披薩是超市買的盒裝成品，早餐也只是普通的“幸運符”盒裝麥片。我們家的巔峰時刻大概就是我父母把一輛第一手的大眾牌房車開回家的那一刻。隨著我越來越懂車，假期這些浮華的愛國午餐餐會和橋牌桌看起來越來越荒謬，甚至令人厭煩，像是給一群人除了按點露面之外別無所長的人們舉辦的一場無休止的生日派對。我屬於相信“能者居上”的新一代，並對“才能”有着簡單明瞭的定義：成績、學分、塞滿簡歷的經歷、桌游水平和籃球水平，當然還要能自食其力。對我來說這意味着幫鄰居做家務，在附近一家快餐店打卡上下班，並通過獎學金一路刷過本科和研究生。我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優勢，但錢並不是其中之一。

現在的我是新貴族的一員，雖然我們依舊自認是靠自己能力勝出的。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讀者，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的一員。(如果你不是其中的一員，我希望你會覺得這篇關於新階層的文章更加有趣、也更引人警醒。)我將稱我們這群人為 9.9%，原因後面會講。當然我們這群人是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我們不再拘泥於舊貴族的繁文縟節，我們信奉事實和數據，我們的種族和膚色也似乎多樣了一點。像我這樣對舊統治階層仍有些模糊記憶的人是少數，不是主流。

按照任何社會學或者財富上的標杆，成為我們中的一員都是好事情。當我們的孩子更是好事情。我們的健康、家庭生活、朋友人脈、教育背景和金錢都讓我們在任何競爭中見神殺神。然而在我們視野的正中心卻有一個盲點：我們似乎是最後一個意識到我們正在多快地變異的群體，我們似乎也認不清我們正在變成什麼。

我們這個“賢能階層”(the meritocratic class) 已經熟練掌握了以犧牲別人的孩子為代價來鞏固財富和傳遞特權的舊伎倆。在我們這個時代財富集中的過程中，我們並非無辜的旁觀者。我們是一個慢性扼殺經濟，破壞美國政治穩定和侵蝕民主的過程中的主要幫兇。唯才主義的幻覺讓我們意識不到我們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所代表的問題的實質。我們傾向於認為我們成功的受害者只是那些被擋在俱樂部門外的人。但歷史很清楚告訴我們，在我們玩的這場遊戲里，到最後不會有一個贏家。

2. 9.9%的低調魅力

我們首先來談談錢——即便金錢不過是新貴族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美國不平等日益

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

(連載一)

我的理解：貴族是精神層面的，貴是文化的教養，社會的擔當和擁有自由的靈魂。

最近我問了一位科研人士，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他與其他人回答的都不一樣，道德、品行、社會里人與人關係。

以下是百度說的：中國傳統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彙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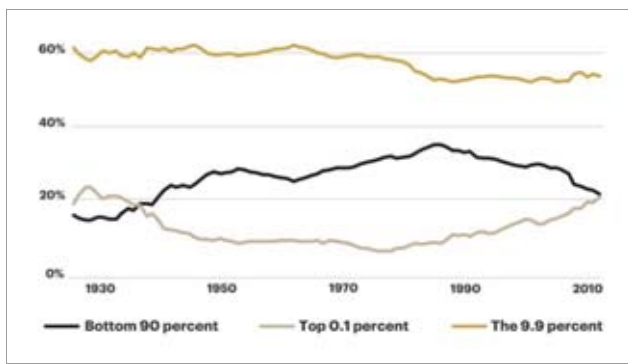
的總體表徵，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簡單來說，就是通過不同的文化形態來表示的各種民族文明，風俗、精神的總稱。

我的理解中國傳統文化 5000 年，人有生生世世，做有道德的人，品行端正，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就是貴族。浦瑛

加劇已經是老生常談，其中各種定式化的人物角色也眾所周知。化石燃料財閥、華爾街大亨、乳臭未干的科技新貴，以及其他他人構成的所謂 1% 階層，都是大反派。剩下的 99% 才是好人，又被稱為“人民”或“中產階級”。這樣的敘事線很簡單：我們曾經是平等的，但現在我們分裂了。這樣的故事並非毫無真實性可言。但故事的人物和情節都存在基本的錯誤。

沒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最富有的 0.1% 階層是財富集中的最大贏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 年屬於 0.1% 階層的約 16 萬戶家庭掌握了美國 22% 的財富，這一數字遠高於 1963 年的 10%。如果你想尋覓能收買選舉的金錢，去 0.1% 那里找，你不會落空。

圖 1 關於三個階層的故事



9.9%階層擁有美國的大部分財富 Saez / Zucman

相對而言，0.1% 階層不斷取得的社會財富分成都來自其他階層。但並非所有 99.9% 的財富都遭瓜分。只有底層 90% 的人遭受了盤剝。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底層 90% 的人群掌握了全國 35% 的財富，達到了其巔峰。30 年後，這一數字下降了 12%——這和 0.1% 階層增長的財富完全相同。

處於頂層 0.1% 和底層 90% 之間的這個群體過得還挺不錯的。過去的數十年中，這個群體在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中保住了自己的份額。這個群體擁有的財富遠遠多於其他兩個群體擁有的財富的總和。在三個階層(見圖 1)的敘事中，代表這一階層的財富總量始終穩定的飄在最上方，而其他兩個階層此消彼長。你現在能看出新興貴族階層是誰了：我們就是這 9.9%。

那麼我們這 9.9% 都是怎樣的人？我們大多數並非那些 0.1% 階層中高調張揚的政治操盤手。我們是彬彬有禮、衣着得體的律師、醫生、牙醫、中層投資銀行家、有着玄虛工作頭銜的 MBA，以及其他各種白領——那種你可能會請來共進晚餐的人物。實際上，我們都不愛拋頭露面，我們甚至否認自己的存在。我們堅稱自己是“中產階級”。

截至 2016 年，要有 120 萬美元的淨資產才能進入這個階層；該群體資產的中位數是 240 萬美元；資產 1000 萬美元就進入了最頂端的 0.9%。(如果你還夠不上這些數字，也別緊張：我們的圈子向所有人開放，只要你態度端正，路線正確。)"我們是 99%"聽起來理直氣壯，但這不過是一句口號，而非具體分析。哪怕是我們這個(9.9%)群體最低端的家庭也不會知道怎麼使乾草叉。

我們也不全是白人，不過大多數都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非裔美國人在財富排名前 10% 的家庭中佔 1.9%；西裔佔 2.4%；其他少數族裔，包括亞裔和多血統裔群體，佔 8.8%——儘管這些群體合計在總人口中佔了 35% 的比例。

9.9% 式生活的一個危險就是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向上看。我們懷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從的複雜心情向上凝望着 0.1%。我們也因此錯失了我們時代中更宏大的敘事。我們將剩下的 90% 遠遠甩在身后的飛塵中——並且已經悄悄地我們已經經過的路上鋪設下了路障，保

證他們永遠趕不上我們。

假設你位於美國財富分布的中間位置。你要跳多高才能夠到 9.9% 呢？從財務角度來說，衡量方法很簡單，趨勢也很明顯。1963 年，你需要將自己的財富增加 6 倍。到了 2016 年，你要跳的高度翻了一番——要將你的財富增加 12 倍——才能夠到這一群體。如果你有膽量要達到這一群體的中間位置，而不是最低端，你就需要將自己的財富乘以 25。從這樣的角度來看，2010 年代更替 1920 年代。

如果你的起點是有色人種的中值，你就得好好鍛煉財務撐杆跳高的技藝了。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計算指出，2013 年，除去傢具和家庭汽車等“耐用品”的價值，黑人家庭財富淨值的中值是 1700 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財富中值是 2000 美元，而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則是 11.68 萬美元。2015 年波士頓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地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是 24.75 萬美元，而非裔美國人家家庭財富的中值僅有 8 美元。沒錯，這不是筆誤。這點錢只能買兩杯中杯卡布奇諾。要想進入 9.9% 還得再加 30 萬杯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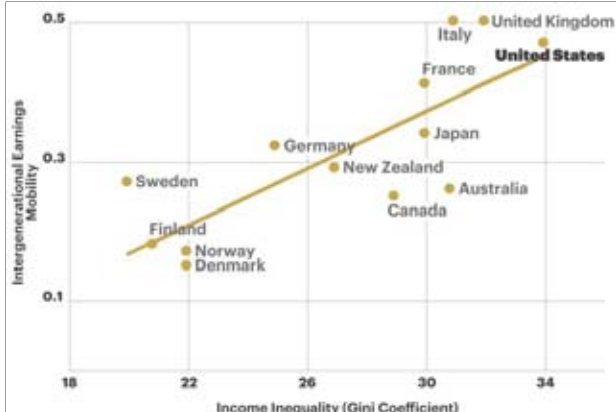
你經常會聽人說這些數據都不重要，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飛躍：經濟流動性賦予不平等以正當性。這個觀點從根本原則上就不成立。而在美國，這個觀點說的也並不是事實。與流行的說法相反，經濟流動性在這片機會之地上不僅不高，而且還在降低。

想象你自己站在社會經濟的梯子上，腳踝上捆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頭捆在你父母所站的梯級。橡皮筋的強度決定了你脫離自己出生時的梯級有多大的難度。如果你的父母站在梯子的上端，當你往下掉時橡皮筋會把你拉回來；如果他們站在下端，你開始向上爬時它就會把你往下拽。經濟學家把這樣的概念描述為“代際收入彈性”，或簡稱 IGE，這一概念衡量的是孩子收入和整體平均收入之間的偏差有多大比例是由父母收入造成的。IGE 為 0 意味着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間沒有任何聯繫。IGE 為 1 表明孩子的命運早在一出生時就完全注定了。

紐約城市大學經濟學教授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表明，在半個世紀前，美國的 IGE 不到 0.3。而現在是 0.5 左右。在美國，一旦你選定了父母，遊戲已經過半程了。美國的 IGE 現在比其他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都要高。在衡量經濟流動性這個指標上，美國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者德國。

看看最緊的橡皮筋在梯子上所處的位置時，事情就越發令人不安了。例如加拿大，IGE 只有美國的一半。在兩國收入階梯的中間部分，後代都會以不錯的速度向上或向下移動。但不同的是兩端的情況。在美國，位於低端 10% 的孩子，而且特別是位於頂端 10% (包括 9.9%) 的孩子，最終停留的位置都接近他們的起點。在這片機會的樹林中，果樹越高，果子掉落得就離樹越近。

在這里要說明一點，所有這些對財富百分比的分析，只不過是對美國不斷演變的社會階層體系瞭解的入門。人們在不同的財富分層中移動時候並不一定會改變其所屬社會階層，並且他們所處的社會階層在自己眼中可能和在別人眼中也不一樣。然而，即便財富統計數據上的



趨勢並不能完美說明更深層次的變遷，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仍然記錄了我們社會中目前正在發生的劇烈轉變。

幾年前，曾任奧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在回顧國際經濟流動性數據時，注意到了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表象下的根本性變化。他指出，不斷加劇的經濟固化和不平等並非如海上兩片浮木，碰巧在海灘上同時出現；它們總是相伴相生。在各個國家，不平等程度越高，IGE 也越高(見圖 2)。就好像是人類社會有一種自然分離的傾向，然後一旦不同階層分化差距足夠大，固化就會開始。

圖 2 蓋茨比曲線：不平等與階層固化相伴相生 橫軸：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數) / 縱軸：代際收入流動性 Miles Corak

經濟學家一般都很謹慎，他們看到這樣的圖表後會告訴你，這只表明瞭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這對於我們這些處於頂端的人來說是個方便的不置可否，讓美國作為立國之本的唯才體系(meritocracy)神話得以延續：我們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敗無關。這樣的想法讓人舒服。但古今各國，富有階層都是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推動固化過程。他們將金錢從生產活動中拿走，花在建立高牆上。此外，歷史上總有一個上層的社會群體承擔了保衛和維護這些高牆的責任。這個群體曾經被稱為貴族。現在就是我們 9.9% 階層。兩者的主要差別就在於我們找到了假裝是中間階層的策略，並以此來維持自己頂層的位置。

克魯格很喜歡圖 2 這張圖表，喜歡到給它取了個名字：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這名字取得不錯，讓我有強烈的共鳴。F·斯科特·菲茲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那部關於美國夢碎的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在 1922 年，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錢從標準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個空殼公司之時。小說出版於 1925 年，同一年特別檢察官提交了證據，證明那家公司的債券最終流轉到了內政部長手中。當書作者在巴黎的咖啡館喝着咖啡時，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國參議院發出的質詢傳票，要求他就他在茶壺山醜聞案中扮演的角色提供證詞。我們現在正在接近那代人在 1928 年所達到的社會不平等的巔峰狀態。我敢肯定他們當初也以為那樣的狀態能永久持續下去。

3. 物種起源

金錢買不來教養與品味，起碼我祖母是這樣認為的。但金錢可以雇來私家偵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爾會當時尚模特(有點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黛西·布坎南)，所以當她的大兒子宣佈要娶一名來自西班牙的女人時，她很清楚地怎麼處理。一名偵探迅速打聽到了並向祖母彙報，這名未來的新娘家在巴塞羅那街頭以賣報為生。祖母立即宣佈全面切斷兩方聯繫。實際上，我母親家里經營着一家大型紙製品工廠。當孩子出生後，祖母終於讓步了。為了讓一切都名正言順，她為這個當時隨軍駐紮在夏威夷的新的小家庭操辦登上了紐約社交名人錄。

社會學家會用枯燥的語言說，我的祖母是個家族社會資本的狂熱管理者——她不會讓西班牙街頭的小屁孩損失自己家的社會資本。儘管她把基本事實搞錯了，她的確有自己的道理。金錢或許可以衡量財富，但並非財富的唯一存在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網絡、個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也都是有錢人之所以為有錢人的原因。這些非金錢形式的財富並不僅僅是我們作為貴族階層所得到的好處。這些是我們身份的定義。

我們有好的家庭、好的健康、好的學校、好的鄰居和好的工作。我們也許可以自稱“五好”人群而不是 9.9%。我們與在這些方面沒有那么好的人們有着天壤之別，這些差別快要讓我們逐漸演化成一個新的物種。就像在我祖母那個年代，物種的形成緣起於一個愛情故事——或者，你也可以叫它——性選擇。

換個禮貌點的說法，這叫選型交配。這個詞彙有時候也會用於形容互聯網時代產生的新奇跡，比如爆米花終於遇上了黃油或者揚基球迷遇上了揚基球迷。實際上，當今對於選型交配的狂熱的起源是簡·奧斯汀小說中女主人公們所公認的事實：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會導致潛在的合適而富有的配偶越來越少，與此同時也加大了尋找到合適配偶的好處與找不到合適配偶所需付出的代價。一項研究表明，上一次有婚姻伴侶如此大規模的按照教育水平來配對還是 1920 年代。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還好這個配對過程沒那麼明顯。你在精英校園的樹下，或是高端專業事務所迎新活動中遇到心儀的那個人，不知不覺你的財富就翻番了。但有時就如祖母擔心的那樣，額外的措施也很必要。在這些方面，我們現在的新技術足以讓過去那些笨手笨腳的社交偵探感到羞耻。藤校畢業生想要尋找門當戶對的伴侶可以申請加入一個叫聯盟(League)的約會服務。這個服務理所當然的很挑剔：來自紐約的申請人中只有 20% 到 30% 最終得以加入。有時人們把它叫做“精英們的 Tinder”。

未完 見下期連載